



巴西的大众土地改革 与土地斗争



汇编27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0年4月

*2018 年 MST 发起的一场要求释放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 (Luiz Inácio da Silva) 的游行。5000 多名失地劳工在四天内游行了 50 多公里。

——茱莉亚·朵尔奇 (Júlia Dolce)

巴西的大众土地改革与土地斗争





*如今，MST 的八万成员家庭住在营地里，等待着他们的合法土地权益获得保障。
——MST 档案

导言

土地问题是理解巴西政治生活和社会的核心。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成片地块，被称为大庄园 (latifundios)。大庄园起源于 16 世纪初期，当时葡萄牙刚刚占领了南美洲这片地区。葡萄牙侵占土地并建成大庄园（连同用于出口的单一培植作物以及对人的奴役）奠定了持续至今的社会不平等。

2017 年，巴西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不仅土地不平等的体系多年来一直存在，而且土地集中度也有所增加。在巴西农村，大约 1% 的土地所有者控制了近 50% 的土地。一半的农村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面积少于 10 公顷（一个足球场的面积约为 1 公顷），但这些土地仅占总土地的 2%。换句话说，大部分土地的面积都十分可观，而仅为极少数土地精英持有。

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说明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的土地征用规模之大，给巴西的发展造成了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土地关系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在根本上造成了巴西的不平等现象并后续激发了其社会潜力。土地的概念不仅包括领土，还涵盖了人、自然资源以及对它们的控制，广义上说还包括土地开发。



* 农民联盟（Ligas Camponesas）是巴西农村最早将土地改革作为政治路线的组织之一。他们的主要口号是“诉诸法律和武力搞土改”。

——作者未知

在老朽低效的大庄园之上出现了农商巨头。在巴西，土地斗争的核心不再是大庄园主与贫农之间围绕小块土地的冲突，现在的焦点是巴西的农业模式方向。大型农商企业不仅占据了大片土地，而且在单一种植原则的基础上种植作物，它们还用大量的农业毒素毒害大自然、人类以及牲畜，使巴西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业毒素消费国。与这种有害的农耕法形成对比的是农业生态模式，它的前提是以人类关系为本的综合生产系统。在农业生态模式中，人的健康、文化、娱乐、教育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例如，这种模式致力于生产各种必须有益于自然的健康食品。本汇编来自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圣保罗），其中心议题便是有害的农商企业模式与农业生态模式之间的竞争。

农业生态模式的关键是大众土地改革概念，提出全面重组土地所有权，此话题将在本汇编中得到讨论。不过我们首先要概述巴西土地斗争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理解大众运动动向的关键，而正是这些大众运动引发了反抗有害的农商模式的阶级斗争，并支持连贯性的农业生态替代方案。在汇编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讨论由无地农民运动（MST）组织的土地改革根据地，根据地作为一种新的农业生活理念及模式描绘了具象的图景。

本汇编于4月发布，是因为该月对于巴西土地斗争有着重要意义。1996年4月17日，在帕拉州（Pará），宪兵袭击了无地农民，造成21人死亡，69人受伤，被称为埃尔多拉多卡拉雅斯（亚马逊丛林北部小镇）大屠杀，该纪念日现在成为国际土地改革斗争纪念日。该事件综合体现了土地集中的现状、地主在国家纵容下的无法无天、农村无地农民受到的极端暴力、土地改革政策的缺失以及农民争取有尊严生活的激进倾向。通过该汇编，我们向进行中的土地斗争的致敬。





*MST 将占领土地作为积蓄力量的主要方法。一旦占领了土地，根据地就建立起来了。赢得土地后，这些家庭会分到一些地块，而这些地块就形成了定居点。
——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

第一部分

巴西的土地斗争

巴西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源于大庄园的历史形式。大型地产的土地集中私有化定义了巴西大部分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塑造了其统治阶级的特性。

资本主义经典形态产生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严重分离，其目的是迫使生产者因饥饿被迫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资本主义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后引发了有史以来对农民阶级的最大掠夺。在无法自食其力之后，这些一无所有者只好出现在工厂门口、大地主家门口，靠出卖劳动力来争取工资以及生产商品，资本主义工厂和农场主的利润积累因此与日俱增。这一剥夺权利和约束劳动力的过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条件。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巴西，在那里，资产阶级极度剥削农民，在农业、工业、金融等各个领域对资本积累的控制越来越强。

这一掠夺过程抹杀了农民丰富的文化表达形式，剥夺了他们受教育、健康等基本人权，破坏了他们的独立自主、民族自决以及自我价值感。由此，巴西涌现出各种民众反抗活动。有组织的抵抗活动都遭遇了暴力，包括屠杀和种族灭绝。然而，大多数暴力事件在历史书中都被抹去了。

土著人民难以接受葡萄牙殖民者强加的奴隶制，进行了反抗，但他们的反抗也遭到极端暴力。据估计，到 17 世纪，在这一片后来被葡萄牙人称作“巴西”的地方，250 万土著居民只有不到 10% 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尽管历史书抹去了几个世纪的抵抗活动，土著人民的斗争在巴西人的心中留下了抵抗意识。我们不会忘记土著领袖赛普·蒂亚拉吉（Sepe Tiaraju）的遗言，他去世时满怀深情地说：“这片土地是有人守护的！”

非洲人反抗奴隶制、殖民和暴力的故事对巴西人的意识、历史和社会的塑造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约 490 万非洲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被带到巴西，在大庄园受到奴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甚至包括美国）集合了这么多的奴隶从事种植劳作。非洲人到达后不久就开始反抗，他们的声音在山岭之间回荡。逃离农业种植园的人创造了基隆布（Quilombo，巴西圣卡塔琳娜州的一个市镇），这是一种集体管理的自由领地，非洲文化传统在这里得到蓬勃发展。19 世纪早期的年代，随着奴隶制种植园霸权的衰落，卡波克洛斯人（caboclos，亚马孙河沿岸城镇居民），也就是黑人和土著农民成为反抗大地主斗争和起义的主角。比如基隆布，他们在自己的村镇接管权力，建立民众的政府。但这些大众权力机构的主张并未摆脱国家带头的攻击，他们的村庄被烧毁，领导人被行刑队处决，人民取得的成果被粉碎。

一个世纪以来，经过数百次这样的斗争，他们的经验逐渐成熟并发展成为更深更强的组织形式，如农民联盟（Ligas Camponesas）和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dos Agricultores Sem Terra，简称 MASTER）。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这些组织通过占领土地、建立根据地推进了土地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斗争。然而，长达 21 年的军事独裁政权（1964 年至 1985 年）摧毁了这些组织，从而使得工人丧失了动员其力量的能力。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工人才得以重建自己的组织，重新开展斗争。

大众斗争的回报

军事独裁是无法持续的，它逼得社会各阶层奋起反抗。正是在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出现了各种政治组织，特别是工人党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简称 PT) 和联合工人中心 (Central Unica dos Trabalhadores, 简称 CUT)。此外，一些因不合法而停摆的团体，如全国学生联合会 (Uniao Nacional dos Estudante, 简称 UNE) 开始重新活动。这些组织及其发起和整合的斗争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打破了势力均衡，导致独裁政权垮台。

农村的情况也不例外。绿色革命引发的一大矛盾是数百万工人被逐出农村。土地占用者、租客、雇工、佃农以及因水坝修建遭到驱逐的人等社会群体为反抗独裁统治、反抗地主创造了培养环境。对他们来说，土地占领成为了对抗大庄园和独裁统治的主要方式。

1984 年，无地农民运动 (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 简称 MST) 就是基于这些经验而产生的。MST 有三个核心目标：

1. 土地斗争。与之对应的是为无地者争得土地的直接斗争
2. 土地改革。没有国家制定的支持土地改革和土地权利的土地政策，获取任何土地都将只是暂时的，而土地上的居民将面临被驱逐的危险。
3. 社会转型。如果没有彻底的社会权力关系重组，即改变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等级制度，人民失去土地的深重危机就不可能有长期解决方案。

MST 将占领土地作为积蓄力量的主要方法，土地占领有双重功能。首先，他们质疑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被用于剥夺社会大多数人权利的做法，它与共有土地用于公共利益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其次，他们谴责土地没有履行独裁政权终结后的 1988 年宪法规定的“社会功能”，该宪法规定所有财产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例如：必须具有生产力，必须遵守环境法规，必须遵守劳动法。不符合这些条件的，可以土地改革的名义征用该片土地。在 MST 领导的斗争中，大约 35 万户家庭获得了土地，另有 8 万户家庭住在遍布全国的根据地中，这些根据地仍在争取合法地位。

在 MST 成立以来的 36 年里，土地斗争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政治时刻，每一个时刻都伴随群众斗争，这些斗争有着适应当时阶级结构和力量关系的不同战略策略。在早期，主要矛盾发生在被逐出土地的农民和大地主之间。在这一阶段，巴西乡村是由古老落后、效率低下的大庄园组成的，庄园主以暴力作为保护其私有财产的主要手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再民主化时期，MST 在全国范围内扩张，组织了由成千上万无地家庭为主的占领大庄园行动。两个主要口号推动了土地斗争：“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民主”和“占领是唯一出路”。通过农民家庭分片占领大庄园，第一批定居点形成了，这些家庭如今生活、耕种的定居点成为土地改革的事实佐证。

随着民主化浪潮的发展，大庄园主成立了农村民主联合会 (Uniao Democratica Ruralista, 简称 UDR)。UDR 迅速成为大地主用来对付 MST 的暴力武器，并向联邦政府游说和施压，使其压制农民运动。上世纪 90 年代，当巴西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时，UDR 连同国家一起对无地者和 MST 发起了一场暴行。人们在和平示威中遭到暴力镇压，主要组织者遭到逮捕和监禁，土地改革秘书处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包括窃听电话和乱闯办公室。

大庄园和国家所施加的暴力以及大庄园组织的低效使得社会上土地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无地斗争被公认为正当行动。在这一时期，MST 进行了几次土地占领，组建了抵抗、自卫的基地，并围绕合作社的粮食集体生产对已占领的土地进行管理。这场斗争从被占领土地蔓延到城市街头，全国范围内都举行了游行，并要求进行联邦层面的土地改革。在这一时期，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政治路线也得到了加强。

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巩固标志着巴西工人阶级的境况倒退了一步。不过，农商企业还没有完全渗透到农村地区，MST 利用这一点来组织根据地和定居点。该运动于 1997 年举行第一次全国游行，声讨新自由主义计划，要求为 1996 年埃尔多拉多卡拉雅斯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并与社会各界进行对话。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该运动迅速发展，并在此期间成为巴西左派的一个关键支柱。

典型土地改革与资本主义的转型

要解决国家权力和社会平等的问题，就必须围绕农业问题进行辩论。18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显著影响，尽管世界各地的农业变革方式各不相同。例如，欧洲的情况在巴西并没有得到完全复制。然而，首先追踪“典型”故事是有用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农业资本主义运作的模板，可以在巴西的例子中进一步发展这个故事。

从18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各地重组土地所有权有一个宽泛的政策。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为地主和资本主义农业创造了大型农场。土地集中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推进，工业革命发现有必要将农业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工业革命吸收了大批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和工匠，他们被迫在工厂门口出卖劳动力。一个基于剥削劳动力、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复杂经济体得以发展。土地问题是使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服从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有两个相关的核心因素构成了土地问题。首先是工业资产阶级力争取代拥有土地的农村旧有阶级，用资本主义术语来说，后者对土地的低效利用阻碍了资本主义积累动力。二是工业资本抛弃了封建主义旧逻辑，把自身的资本主义逻辑置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业资产阶级推动了将工业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带入田间的进程，但也确保国家经济政策围绕工业需求而非农业需求来制定。资本积累以工业发展为中心，创造廉价劳动力、保证原材料充足成为整个经济的必要因素。

然而，随之而来的土地“民主化”（即地主权力的相对丧失）并没有使农民受益。相反，结果是农业部门乃至中小农场被迫以低价为日益壮大的工业部门

提供原材料。由于社会再生产成本受抑制导致农业生产者社会地位削弱，向城市运送廉价食品使工业企业能够支付较低的工资。随着农业土地生产力提高，农民转而成为工厂工人，而留下来的人则被卷入了日益扩大的消费市场。

农村经济实力的振兴是以其从属于城市、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地位为代价的。世界上许多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了资本主义土地改革。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尽管故事不只发生于欧洲。在日本，由于土地改革，近 300 万人成为土地所有者；在土耳其，500 公顷以上的土地被征用；在意大利，国家征用土地并向土地所有者支付补偿金，在农村发展基础设施，重新开垦退化的土地，并为农民建造房屋。在这些例子中，农民服从于资本主义的逻辑，因改革而受益的是资本积累，而不是农民的福祉。

农业生产过程逐渐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义。决定失业恐惧和生产速度的因素逐渐由奴隶种植园和封建庄园中的鞭答转变为经理们的时间纪律。资本决定了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企业定义了商业化的深度和各种层次实地工作者获得的报酬。农民对生产资料表面上的控制权都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不仅失去了生产资料，而且失去了其文化形态的向心力。

资本主义力量以其自身的文化逻辑进入农村，侵犯、否定了农民文化中的生产消费观念，特别是食物生产及饮食的观念。社会规则发生了转变，以个人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取代了以合作和社会融合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资本主义土地改革是资产阶级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是为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

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巴西的情况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和农业转型之间存在几个关键差异。例如，在巴西，农村寡头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本质区分，两者是紧密相联的阶级组成部分，工业资产阶级权力并非通过击败农村寡头而实现。土地集中并非巴西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相反，大庄园和工业资本之间是一致的，资本和国家调节的土地所有权之间存在着联盟关系。尽管如此，土

地高度集中且效率低下的状况还是迫使农村人口外流，从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后备工业大军，他们的存在压低了工资水平。农村经济的严酷条件促进了工业生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

与欧洲不同，巴西没有针对土地重组制定有效的国家政策。相反，农业出现了三大要素：大农场、重型机械化、农用化学品，这些都是围绕着被称为绿色革命 (Green Revolution) 的美国农商模式组织起来的。绿色革命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但在随后的 20 年里愈演愈烈。绿色革命产生的模式完全以资本主义的利益为前提，农民仅仅是生产要素之一。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绿色革命在巴西加剧，该国的农业格局经历了重大结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农产品生产的组织方式发生了转变。土地问题的关键因素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出现、农商企业对农业生产、农产品分配的加强排挤了中小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片土地的旧地主联合了资产阶级的其他群体，也就是控制着跨国农业公司、金融公司和大众传媒机构的群体。这些地主对土地的控制力没有减弱，如今他们通过由企业、银行、媒体组成的农商企业集合向国际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土地和任其支配的劳动力。

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主义体系遭遇了一场严重的盈利危机，农商行业一直在想方设法保住乃至增加利润。这些方法包括变本加厉地破坏环境，向森林和共有土地扩张农耕范围，大肆开采矿产，相应地更加苛待劳动者，劳动者不仅被压榨体力，也眼睁睁地看着共同土地消失。

随着农商企业趋于复杂化，对政治经济的控制不断加深，大众土地改革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且必要的选择。大众土地改革的主要诉求向着激进的方向发展，反对资本主义对农业（包括土地）领域的控制，主张重构农业与环境的关系，关注人与自然的需求而非利润。



* 农业生态学是大众土地改革的核心，它优先考虑生产健康、多样的食品，食品生产要与环境协调，而且是为了人民消费得起，而不是为了供应出口市场。
——威灵顿·莱农 (Wellington Lenon)

大众土地改革

农商企业的强大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争取古典土地改革已不再合适。因此，MST 正在重新决定其土改方案和战略行动。

资本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这使得在现行制度框架内相对不太可能获得土地，也缩小了民主参与的余地。这意味着，真正的土地改革必须使现有的权力关系脱离私有财产的理念。金融资本霸权凌驾于工业资本之上，导致资产阶级对推动土地改革毫无兴趣；新的财富积累方法已经发明出来，不需要任何土地改革计划或农村民主化计划（哪怕是有限的民主化）。土地曾经是无地农民与落后低效的地主之间的矛盾焦点，现在却被农商企业所觊觎，它们愿意为了一己私欲而不顾这些农村的旧有阶级。

因此，真正的土地改革斗争意味着农民必须直面资本，尤其是农商企业，而农商企业的门面是那些要为自然资源枯竭（包括过度使用农业毒素和转基因种子）负责的大型跨国公司。这种破坏性模式对环境造成的后果正逐渐被世界上大多数人，特别是大城市中心的居民所感受到。水源缺乏与污染、食物中毒是两个晴雨表，但更令人担忧的证据是资本主义导致的气候变化和城市危机。农村危机与城市危机有着内在的联系。

现实迫使我们再次调整土地改革的斗争，将议程从传统土地改革转向大众土地改革。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核心需求是为土地上的劳作者争取土地权，之后演变成为全体人口的健康食品争取集体生产权，这种诉求使得土地改革具有了普遍性。这样，土地改革将成为一项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计划，而不仅仅是为了土地上的劳作者或愿意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农村中农民的力量不足以改变相关势力，他们需要一些重要的城市盟友，这些盟友要加入这场不仅是为了声援农民而且要符合社会利益的大众土地改革斗争。



* 这是帕拉那州伊瓜苏河畔里奥博尼图一个叫做“大地继承者”（Herdeiros da Terra）的根据地，自 2014 年以来，大约有 1100 个无地家庭占据了这片土地。
——威灵顿·莱农

今天，大庄园的旧地主不再是土地斗争的唯一目标。土地所有者已经成为农业企业、金融体系、大众媒体的关键盟友。正是后者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大型农业企业才能有效利用土地，从而增进社会利益。事实上，古老而低效的大庄园已经被“现代化”了，生产力现在大大提高了，但是这种生产力有利于农商企业的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大众土地改革研究出一种反对农商企业模式的策略，并提出了新的斗争形式，既挑战农商企业的根基，又为未来（基于改变现状的有效行动）提出了新的方案。

农商企业模式建立在出口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这是整个生产的焦点，这就是这种农业形式不关心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农用毒素的使用、土壤贫瘠、地下水污染、食品污染、资本主义农业扩展到森林和公共土地（包括洪泛区）即为例证。

另一方面，农业生态法优先考虑生产健康多样的食品，食品生产要与环境相协调，并让人民消费得起，而不是为了供应出口市场。这种方法发展了一种分配收入的经济模式，使人们能够留在农村，而不是被迫流向城市地区。大众土地改革在农村发展了农业工业，由住在联合定居点的工人掌控。

大众土地改革概念不仅涉及资源的生产和组织，还涉及社会关系的重塑（比如重构性别关系、反对大男子主义和恐同现象），还有农村各阶层获得教育机会的需求。土地改革提出的社会转型还包括在生活于农村的工人中建立自治合作形式，同时发展与城市群众的政治关系。

这个方向的计划已经有了不少，如发展农林业，培育本土种子，发展当地控制的加工业和农业工业、增加由合作社举办的博览会以及为了发展农业新科技而扩大科学研究与技术培训。

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和摆在面前的挑战，我们务必要指出，促使 MST 重新制定其农业战略的不仅仅是资本的变化。战略变化的根源是对在根据地和定居点生活的无地家庭所形成的社会进行改造的必要性。正是由于他们在建立新政治文化、组织文化方面的经验，大众土地改革的概念才得以成熟。产生于这些经验的大众土地改革计划并不局限于农村，是对整个国家新愿景的广泛要求，巴西工人阶级是无地农民的重要盟友。



第二部分

“边境征服”：斗争、合作、组织的历史

如果必须选择一个词来定义在圣卡塔琳娜州迪奥尼西奥塞尔凯拉市的“边境征服”定居点，这个词就是合作。

作为 1988 年进行的土地改革的一部分，46 个家庭居住在其占用的 1198 公顷的定居点。对他们来说，合作和集体的概念是基本的，但他们斗争的另一个支柱：组织也是基本的。“边境征服”的历史与圣卡塔琳娜地区 MST 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今天住在这个定居点的家庭正是 1985 年占领大庄园的那些人家，当时 MST 刚刚成立一年。

“边境征服”的居民厄玛·布鲁内托 (Irma Brunetto) 参与了该定居点的建立。在居民们住在黑油布帐篷里等待合法土地权获得保障的那三年间，MST 与开始耕种的家庭一起开展基层组织工作，这一过程让大家思考这次土地占用的政治性质，思考集体生产的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就在改进与土地的关系，比如我们自己如何合作；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想法，因为一开始都是有过程的。”厄玛说。

居民对新家有了一定了解后意识到理想的前进方向是发展集体生产。“看到这个地区的地形，我们发现 40% 的土地都是丘陵。我们意识到把土地分成小块是行不通的。”厄玛回忆道。

如果每个家庭都分到单独的地块，其中一批分到平地 and 充足水源的家庭就受益很大，而另一批分到多石土地的家庭就大为不利了。因此，土地和生产集体化的理念形成了，而他们早在油布帐篷时期就在实践此事了。



* “边界征服”定居点的社区菜园负责生产居民消费的所有蔬果。
——MST 档案

合作

“边境征服”的居民在正式定居点建立两年后，于1990年建立了“统一合作”（Cooperuniao）社。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家庭而言，合作社是其定居点组织结构的核心，也是巴西许多无地劳工合作社的一个例证。

“统一合作”社的成员被分成几个工作小组，其中一些负责种植口粮食物，一些负责植树造林，一些负责饲养禽畜，还有些工作小组负责定居点的行政、社会工作。这些家庭坚持每年进行一次规划，安排必要的生产事项以及定居点的财政事宜。关键事项先由主要小组讨论，然后由大会批准。决策在随后的12个月里付诸实施，直到下一次规划开始。“我们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组织体系，建立了内部制度。首要目标是生产用于糊口和销售的食物，因为我们在根据地生活的三年间没能满足所有需求。我们还着手进行更为长期的计划，目标是生产工业化以及农产品增值。”厄玛说。

民主协商导致大规模、多样化生产过程的产生。目前，该定居点的主要产品是牛奶，出售给位于沙普科（Chapécó）的另一个MST定居点“西部合作”社（Cooperoeste），后者对牛奶进行加工并以Terra Viva（意为“生活的土地”）品牌出售。“边境征服”定居点的牲畜是由一种名为瓦赞放牧法（Voisin Grazing）或合理集约放牧法（Rational Intensive Grazing，简称PRV）的轮牧系统喂养的，这是牲畜繁殖的一种农业生态替代方案。牲畜饲料由位于定居点的饲料厂生产。

牛奶虽然是该定居点的主要产出，但并不是唯一的农业活动。该定居点出产谷物、马黛茶，繁殖猪、牛、蜜蜂（用于采蜜）以及家禽（用于产蛋），还有12座水坝用来养鱼。根据地居民正在修理1997年启用的老旧禽肉冷库。冷库扩大后，每小时有望屠宰3500只鸡。

这里还有一个菜园，为居民种植蔬菜，每个家庭每周可以摘三次蔬菜。“蔬菜是按现有数量分配的。没有人会去随便拿蔬菜，决定分配的人是负责打理菜园的人，但你总是会满载而归。”厄玛解释道。这种生产方式保障了“边界征服”居民的生活。“我们的饮食结构非常不错，有肉有蛋有奶，还有无害的有机食物，我们很少从市场上买东西。”

菜园旁边有一个苗圃，它既有助于在大庄园导致的荒地上植树造林，又能美化住宅旁边的土地。植树造林属于定居点规划的重要内容，目前定居点约有40%是林地。

劳动报酬是按定居点成员的工作时数计算的，每月底将所有人的工作时间汇总，然后依据工作时间分配合作社的总收入。



* 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土地改革博览会。这个年度盛会在四天的时间里聚集了 20 多万人，并成为 MST 与社会各界对话的主要渠道。展会提供约 420 吨、多达 1530 种的产品。

——约卡·马德鲁加 (Joka Madruga)

教育与健康

“边境征服”不仅仅是为生存和销售而生产商品的合作社，依靠合作社的居民福祉至关重要，特别是他们的教育和健康。斗争伊始，教育就得到优先考虑。厄玛说：“我们在争取为自己造房子前就争取建造了一所学校。”正是应了定居点最早那批家庭的需求，名为“开辟道路”（Construindo o Caminho）的市级学校才应运而生了。

自1990年学校开办以来，关于教育性质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仅仅教授基础的读写是不够的，有必要让学生融入到适应大众土地改革需要的教学过程。厄玛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所以采用保罗·弗雷尔的方法来完善。”厄玛说。学校共有四个年级，教学过程都会贯彻一个中心主题。学生自己负责学校管理，就像在合作社一样，他们共同做出决定，为学校的运作及其开展的活动制定规则。

集体组织的理念不仅是学校的核心，也是社区休闲部门、卫生部门的核心。卫生保健是该定居点的一个关键部分，并将草药纳入其公共卫生实践。

学校的教学方法（课程和学校组织形式）使其成为右翼政党执政的市政当局的打击对象。他们试图关闭学校。然而学生却占领了市政厅。厄玛说：“这所学校是反抗的象征，所以他们想关掉，因为这是一种重要体验，他们知道我们的意识正在觉醒。”



* “大地继承者”根据地的这所学校有 10 间教室、一个食堂、一个行政办公室和一个图书馆，有从小学到高中的 200 多名学生以及大约 24 名教师。

——威灵顿·莱农

挑战

“边界征服”现在已有 31 年历史，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也面临了许多挑战。厄玛平静地说：“这个定居点建立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谁也不能说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地方。”

这里的一大挑战是让年轻人留在农村，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到了一定年龄后都去了城市。“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留住年轻人，提高收入，保持团结合作的精神。在我们这样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我们是在逆流而动。”厄玛说。

厄玛已经在“边界征服”生活了 30 年，说她和同志们希望这个定居点不再是特例，而是成为普遍规律，但这只有当大众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推行后才能实现。“很多时候，我们到头来在定居点还是遵循了农商企业的逻辑。不过，我们进行抵抗的重要之处在于我们在农业生态、合作与团结上的对话，这才是我们快乐的原因，我们因此感到活力，有了坚持的勇气。大众土地改革主题在各方面都对社会提出了富有成效的挑战，它是一种诠释健康食品、农业生态、社会生活的方式，还表明农村是美好的生活所在。





MST 在其 2014 年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游行。游行是该运动的主要斗争手段之一。

——Ninja 媒体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
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